



B 学会记工分的李永义自此就迷上了学习。

生产队里有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,李永义常跑到他家去帮忙干农活,来换得和这个年轻人学习的机会。“基本上,就是看到不认识的字就写下来,问他是什么意思。那时候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,街上满是标语,我就是从这个开始学起的。”李永义说,那个年轻人有个四角号码字典,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四角号码字典是怎么查字的,只是觉得那个年轻人十分了不起,“我只要告诉他一个字的写法,他就能脱口报出这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,我当时佩服得不得了。我想,他也太厉害了,一本这么厚的字典都背下来了”。

直到有一天,他到镇上去,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,而售货员告诉了他这本字典的查字方法。“我当时毫不犹豫就把这本字典买了下来,然后回家照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学。回家后,我妈得知我花了4.8元买了本字典,气得大骂了我一顿,我不服气还和她顶了嘴。要知道当时4.8元在农村里可不是小钱!”李永义的这本四角号码字典到现在还留着,“可以这么说,我认得的绝大部分字都是从这本字典上自学来的,留着它算是对当年的一个纪念。”

开启了自学模式的李永义一边认真学习,一边热情地参与了生产队里的宣传活动。“出黑板报,写宣传标语什么的,只要是叫我,我就去。”很快,李永

义入了团,并成为了当时丹徒县三宗乡的团支部书记。同时,他也成了当时乡里的小文化人。

1973年,“小文化人”李永义被高资人民公社选为放映员。“我本以为放映员就是搬搬器材拧拧开关,没想到要学的还挺多。我们在县里的电影管理站培训了45天。”李永义说,那时候,他是天天打着手电在被子里学习、背诵。“那些电流、电压都是用字母表示的,我完全不认得,就写信给我的妻子的哥哥,让他给我用中文把读音记在旁边。那次考试,我们公社去了两个人,另一个考了零分,我六门考试,门门都在95分以上,拿到了省文化厅发的放映员证(图1)。”

学习是我一生的兴趣

70岁的李永义没有什么老照片,理由很简单,年少时家贫;但是他有很多小本本——各种短期培训的证件,理由也很简单,只有刚脱盲文贫的他,将他一生的兴趣都放在了学习上。他说:“对我来说,学习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,它也为我的生点亮了道路。”



文/沙艳秋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出生于1949年。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故事,串起的不仅仅是他们70年来的酸甜苦辣,也是共和国70年风雨兼程走向民族复兴的缩影。是的,他们与我们的祖国同步呼吸,同步前行。



A 1949年,李永义出生在丹徒高资的一户贫困农民家中。他出生时父母都已40多岁,家中只有一个年长他20多岁的姐姐。

“由于我父亲是个盲人,我家里十分贫困,就像《白毛女》中唱的那样,天当被来地当床。所以,我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辍学回家当了个放牛娃,为生产队放牛。”李永义说,由于那时候姐姐早已结婚,家中只靠母亲在生产队里挣的一天八个工分,因此,他总希望自己能快快长大,早点为家里撑起一片天,而这时候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,更没有发现自己原来对学习是那样的有兴趣。

18岁那年,当自己终于可以作为成人劳力到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时,父母都已是花甲老人,李永义暗暗下定决心,一定要把农活干好,多挣一点工分,照顾好父母。

“那时候我们生产队里男女干的农活是不同的,工分也不一样。比如开春种水稻时,女劳力只能拔秧,每天最高是8个工分;男劳力就是栽秧,一天最高是10个工分。我那时因为家里吃不好,人长得很矮小,而且我也不会栽秧,一天只能拿到4个工分。”李永义告诉记者,为了将栽秧的技术学好,他的母亲还特意咬牙买了包好烟,请了一个老把式来教他,“但是那个人还是教得很敷衍”。

怎么办?干农活时偷学,闲下来时自己琢磨技术要领。就这样,第二年时,李永义的栽秧技术就超过了队里一般的栽秧手,很快又成了队首——在栽秧时“挂趟”的那个人。“所谓‘队首’就是生产队里栽秧的样板,所谓‘挂趟’就是每次栽秧时第一个栽的人,他栽了几排后,大家再按照他栽秧的行距和株距来栽。”而让李永义最得意的是,他能一口气从田头栽到田尾,中间不起腰,“中间起腰就会觉得头晕啦,腰背不舒服啦,再继续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累,我就不需要”。不过,他也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当年年轻身体好,还是憋着一口气要好好干,在村里干出点样子来。

“除了栽秧,其他农活我也很认真地学,耕田,耙田什么的都难不倒我,我干得也都很好。”就这样,李永义迅速地掌握了几乎所有的种田技术。而这时,一个算不上机会的机会降临到了他的身上——由于他是贫下中农、成份好,平时干活也吃苦耐劳,生产队里将记工分的工作交给了他。

“我小学三年级都没毕业,算是勉强脱盲,哪会记工分啊。尤其是,我们记工分的表格是要自己绘制的,我当时就懵了。好在我们生产队当时有个南京来的知青,人很热心,我就找到他,请他教我。这时候我才知道,知识是很重要的,种田也要学习。”李永义说。

C 1977年,李永义入了党,随后被调到高资公社当了办公室文书。从那时起,他不再满足写写黑板报,而是希望有更高的平台,“最好能让我的文字变成铅字,或者当地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里能出现‘李永义报道’这几个字”。

有了新的梦想,那就继续学习。除了坚持听广播、看报纸,他又买来了成语字典和字帖。

“我当时是公社的办公室文书,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都要在我这汇总,所以我就有了很多线索。那时,全国各地都在蓬勃开展‘五讲四美三热爱’活动,我只要得知有这方面的好人好事好做法,就会在下班

后赶过去了解情况,然后写成文章投稿……”李永义说,一开始时,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写,文章里大多是宣传口号,事情倒是写得干巴巴的,“最开始我一年被退稿1000多次”。

“但是,那个时候报社和电台的老师很热情,他们会给我回信,有一次我甚至收到了告诉我该如何提高,偶尔还会给我寄他们的内部通讯,里面全是业务论文,我就一遍遍读(图2),照着上面的经验学着继续写。”李永义说,他始终都记得他第一次拿到了稿费,虽然只有0.8元,但是那张小小的稿费单让他学习的劲头更足了,“我参加了不少函授学习班,还得了不少通讯员奖状呢(图3)”。

……
就这样,李永义将他的学习劲头一直保持到了退休,直到现在。“后来,我还学着写诗,退休后又去老年大学学唱歌、学电脑。我还成为了全国志愿者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,学习如何为社会奉献余热。”李永义说,他现在的晚年生活主要是看看报(图4)、抄抄字典唱唱歌,“我刚刚通过了今年‘好声音’的海选报名(图5),不管如何,我想把我在老年大学学到的歌曲唱一唱,算是对学习的一次检查。”